

滕近輝牧師 與香港宣道會

何明章

華中師範大學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一 前言

滕近輝牧師，¹ 原名滕懷智，生於1922年1月15日，山東濰縣人。² 他在基督教的家庭成長，是第三代基督徒，祖父及父親分別為長老會的長老及牧師。³ 滕牧師在十八歲時重生得救，並在一年後委身事主。⁴ 他在陝西省城固縣的國立西北大學修讀外文系，於1946年畢業；翌年轉到蘇格蘭愛丁堡大學修讀神學，⁵ 在1950年底學成歸來並居於香港；⁶ 從此，滕牧師展開了那六十多年的事奉人生，並與香港宣道會結下不解之緣。本文作者以

¹ 他正式成為牧師是在1958年6月28日；筆者為出於尊重，下文將稱呼他為「滕牧師」。

² 滕近輝：《都是恩典——滕近輝回憶錄》（香港：宣道，2009），頁2，11，16。

³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3。

⁴ 鄭炳釗：〈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的分析〉，余達心、馮蔭坤合編，《事奉的人生》（香港：宣道，1982），頁340。

⁵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6~25。

⁶ 黃碩然：〈生命的事奉——我的牧者滕近輝牧師〉，余達心、馮蔭坤合編，《事奉的人生》，頁399~340。

歷史學角度，整理滕近輝牧師與香港宣道會昔日的人與事，並從中探討他在不同時期於該會的不同使命與角色。

二 初出茅廬的滕牧師

滕牧師學成回國途經香港時，拜訪在國內已相識的趙君影牧師，⁷ 趙牧師隨即邀請他留下來擔任《學聯報》的主編；他答應了並且暫住在趙牧師的家中。⁸ 1951年滕牧師開始在廣州聖經學院⁹ 任教，1953年擔任該院的教務主任，直至1955年6月離任為止；這段期間，他同時在伯特利神學院及建道聖經學院（1955年7月易名：建道神學院，下簡稱「建道」）兼任教職，並在1954年擔任《恩雨》雙月刊中文版的義務編輯。¹⁰ 由於滕牧師學貫中西，他出道不久已是一位受人注目的聖經講解者，經常被各教會邀請作崇拜講員；¹¹ 1952年他首次在「港九培靈研經大會」主領研經會。¹² 這個時期，他的心志是希望「把神學教育及文字工作配合起來」。¹³

三 加入宣道會

滕牧師與宣道會的關係，可追溯至他居住在趙君影牧師家中的日子。當時趙牧師帶領的南洋佈道團，每逢星期日早上租借在上環的新世界電影院作崇拜聚會之用，而滕牧師也經常協助崇拜的事宜；因趙牧師是建道的

⁷ 趙君影牧師在解放前於國內西南地方領導「中國基督徒佈道十字軍」及「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致力推動大學生的福音工作與復興運動。

⁸ 黃碩然：〈生命的事奉〉，頁399，404。

⁹ 1965年易名「播道神學院」。

¹⁰ 參以下資料：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8～34；王路易（Louis L. King）：〈賀辭〉，余達心、馮蔭坤合編：《事奉的人生》，頁13；黃碩然：〈生命的事奉〉，頁399～400。

¹¹ 參以下資料：王路易：〈賀辭〉，頁13；鄭炳釗：〈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的分析〉，余達心、馮蔭坤合編：《事奉的人生》，頁340。

¹² 〈歷屆聚會回顧〉，「港九培靈研經會」〈<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index.php/previous-gathering/review-of-previous-meeting.html>〉（2014年9月27日下載）。

¹³ 滕近輝：〈靈程深處自從容——專訪滕近輝牧師〉，《金輝歲月——滕近輝牧師八秩榮壽紀念》（香港：宣道，2002），頁145。

兼職講師，所以他常常邀請該院學生出席聚會擔當獻詩服侍。就這個原故，滕牧師認識了建道的神學生，並與其中一位傅忠愛小姐互相愛慕，他們最終在1953年共諧連理。¹⁴ 另外，趙牧師身兼多職，有些時候無法抽身到建道授課，便邀請滕牧師前往學院代課。就是這樣，滕牧師遂開始在建道兼任教職，並漸漸與當時的院長劉福羣牧師（Rev. William C. Newbern）互相熟稔，¹⁵ 兩人日後的情誼達至「知心之交」。¹⁶

據滕牧師的論述：「我是被劉福羣牧師的愛心吸引到宣道會來的。起初在宣道書局作一些翻譯工作。」¹⁷ 他加入宣道會應該是在1955年或在更早的時候。¹⁸ 1956年，滕牧師獲劉牧師的邀請，成為建道的全職教員，任教神學科目。¹⁹ 對劉氏來說，宣道會有滕牧師的加盟真的是如獲至寶；早期建道的師生，常常聽到劉院長提及的「那位後生仔」，所指的就是滕近輝老師。正因為這個原故，劉牧師給滕牧師有很多發展的機會，例如：劉氏知道他喜愛教書，就在建道多給他授課的機會；知道他喜歡文字工作，就給他籌劃及主編《宣道消息》；後來知道他想牧會，就應允他在建道教學之餘，同時可以兼任牧會工作；劉氏還替他打開前往外地講道的服侍之門。²⁰

¹⁴ 黃碩然：〈生命的事奉〉，頁404。

¹⁵ 梁家麟：〈滕近輝牧師與建道神學院〉，《建道通訊》第174期（2014年1月），頁16～17。

¹⁶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35。

¹⁷ 滕近輝：〈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一位傑出的宣士〉，《劉福羣牧師逝世三十周年紀念專輯》，出版資料不詳，本文作者只擁有零碎的複印文件。另參考王路易：〈賀辭〉，頁17。

¹⁸ 1954年，滕牧師一家已住在九龍城衙前圍道134號4樓，此乃原先宣道會西差會給西教士的寓所。

¹⁹ 參以下資料：滕近輝：《都是恩典》，頁34；王路易：〈賀辭〉，頁15；黃碩然：〈生命的事奉〉，頁399，404；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196。

²⁰ 參以下資料：林高勵志訪問記錄，2014年7月9日；胡欽：《安徽小子——胡欽生命之旅》，增訂版（香港：宣道，2012），頁47。

四 早年在宣道會的服侍

滕牧師加入宣道會不久，就被香港西差會委派了一個非常任務：1956年，他與丘育靈牧師²¹被委任為特別顧問，負責幫助宣道會在香港各個堂會的事宜，而最終工作目標是促成各堂會在短時間內能夠自立——即「自治、自養、自傳」。²²西差會這個安排背後的原因，是宣道會中國—香港宣教區（China – Hong Kong Mission Field）於1953年7月成立，在短短數年間，於1956年已增設有九個堂會，分別為：調景嶺堂、竹園堂、北角堂、筲箕灣堂、荃灣堂、葵涌堂、鑽石山堂、油麻地堂、長洲山頂堂。²³當時，除了在1953年末由差會主席劉福羣牧師發起的「青年事工委員會」及定期的「同工聯禱會」外，各堂沒有聯合的工作與組織，在彼此的溝通及聯繫上顯見不足；再加上西差會與華人牧者在言語及文化上的差異，各堂出現了不同的發展路向。²⁴另一原因，當時各教會都是直接隸屬於西差會，經濟和人事都是由他們主持與分配；²⁵西差會期望能儘早促成本土教會自立，使其能夠抽身並將資源調往其他未聞福音的地方。基於上述原因，西差會在1956年通過香港本土教會的五年自養計劃，²⁶委任兩位曾在西方接受教育的華人牧者（即丘、滕兩位），作為差會與本土教會的橋樑，團結香港各個堂會，統籌各項事工，帶領本地教會走向自立的步伐。

滕牧師接受任務後，在1956年6月出版了一份屬於香港宣道會各堂會的月刊《宣道消息》。在刊首裏，滕牧師開宗明義說明這份刊物承擔的使命：使各堂之間有更密切的聯繫，能互相勉勵並彼此代禱。另外，滕牧師亦透過該刊物報導世界各地宣道會的動態、傳遞福音及培靈信息。²⁷

²¹ 丘育靈牧師，在香港伯特利聖經學院畢業，其後被宣道會西差會選派到美國聖保羅神學院接受深造；1953年畢業回港後加入建道擔任教職至1985年。

²² *The Chairman's Report for the Year 1956-1957* (The C&MA China-Hong Kong Field, 3 July, 1957), 1.

²³ 教區另外在台北也建立了堂會。參以下資料：〈本會佈道事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宣道消息》第1卷第1期（香港：基督教中華宣道會，1956年6月15日），頁4~5；*The Chairman's Report for the Year 1956-1957*, 1.

²⁴ 陳惠榮：〈論香港宣道會教會之增長〉，（建道神學院神學士論文，1973），頁9~10。論文導師是丘育靈牧師。

²⁵ 陳惠榮：〈論香港宣道會教會之增長〉。

²⁶ *The Minutes of the China-Hong Kong Conference in the Year of 1956* (The C&MA China-Hong Kong Field, 1956), 3.

²⁷ 《宣道消息》第1卷第1期，頁1。

從這時候起，滕牧師不斷收集與刊登各堂會及機構²⁸的動態與消息；他亦翻譯了大量有關宣道會歷史、四重福音的教義、宣信牧師（Rev. Albert B. Simpson）的講章、翟輔民牧師（Rev. Robert A. Jaffray）的著作、各地宣道會的狀況，供本地信徒閱讀。²⁹滕牧師擔任《宣道消息》主編至1959年，³⁰而該刊物一直維持至七十年代。³¹及後，聯會有不同的刊物面世，繼續肩負堂會聯繫的重要角色。

除此之外，滕牧師也負責聯合各堂會的力量，組織在香港本地及國外的佈道事工。首先，香港宣道會在1956年4月成立了「佈道事工委員會」，由滕牧師擔任主席，出席者除有各堂及機構代表外，還有西差會代表，合共十九人。會議開始時，滕牧師說明了促進佈道事工的必要，並請各單位報告佈道工作的現況。會中議決設立聯合佈道隊，並每年各堂舉行一次與該佈道隊合作的佈道會或培靈會；另外，區會亦開辦佈道訓練班，培訓對象以各堂負責人為主。³²

至於國外佈道工作方面，1958年劉福羣牧師赴越南講道時，該地宣道會向香港宣道會發出「馬其頓呼聲」，請求香港派人到當地服侍華僑。劉牧師深受感動，回港後隨即在同工退修會分享有關事宜。經過一輪商討後，各人議決成立「中華宣道會國外佈道團籌備委員會」，並選出滕近輝牧師為主席，謝友王牧師、丘育靈牧師、謝真如女士及梁得人先生為委員會成員。³³1960年，「香港區聯會國外佈道團」正式成立，並差遣梁得人牧師全家赴越南宣教；但是，梁牧師因簽證問題不獲入境，佈道團未能實際展開工作。直至1962年，建道畢業生郭錦仙姊妹獲越南政府批准入境，並在同年1月6日於北角堂舉行差遣禮；身為佈道團主席的滕牧師在會中致慶賀詞，宣布香港宣道會國外佈道工作正式開展。³⁴

²⁸ 包括建道神學院、宣道書局等機構。

²⁹ 王路易：〈賀辭〉，頁14。

³⁰ 繼任人是王克章牧師。

³¹ 據筆者有限的資料，1974年10月為最後一期。雖然1992年1月區聯會再次出版《宣道消息》，但其內容已與早前的大相逕庭。

³² 參《宣道消息》第1卷第1期，頁4~5。

³³ 參以下資料：《宣道消息》第3卷第1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1958年7月），頁5；*The Alliance Weekly* 93:20 (24 September 1958): 13.

³⁴ 參《宣道消息》第6卷第1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1962年3月），頁5。

在自治方面，1957年7月他們組成了「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香港區主任會」；³⁵並在1958年開始籌組屬於本土教會的聯會。³⁶最後，在1959年1月由華人組成的「宣道會香港堂聯會」³⁷正式成立，各堂代表選出滕牧師為聯會主席，丘育靈牧師為副主席；各代表同時落實了「五年自養計劃」，期望香港各堂會能在五年內完全自養，無需西差會的供應。³⁸

五 滕近輝牧師與宣道會北角堂

宣道會北角堂（下稱「北角堂」）的設立，是因為宣道聖經學院³⁹有四男一女的神學生，在1952年暑假結伴到當時人稱「小上海」的北角，展開為期四十天佈道的成果。當時北角有一個大型綜合娛樂場所名為「月園遊樂場」，⁴⁰吸引大批遊人前來消閒玩樂；而這班神學生就在遊樂場附近的海濱及屋苑進行佈道工作，並帶領了十數人決志信主。⁴¹這班初信者後來得到西差會的幫助籌組教會，於同年10月12日建立了聚會的地方，北角堂正式成立；而滕牧師因為與傅忠愛小姐及梁得人先生等相熟，⁴²故獲邀在開堂禮擔任崇拜講員。⁴³

及至1957年2月，北角堂為籌建執事會，西差會特派滕牧師到該堂舉行一連三晚的特別培靈會，傳遞有關教會的性質及信徒忠心等真理。培靈會在24日晚上結束，經過半小時禱告之後，北角堂隨即舉行第一屆執事選舉。當時滕牧師與丘育靈牧師以宣道會香港區會代表的身分列席會議。在

³⁵ 姚添壽：〈滕牧與我〉，《都是恩典》，頁154。

³⁶ *The Chairman's Report for the Year 1956-1957*, 2.

³⁷ 即「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的前身。

³⁸ 《宣道消息》第3卷第5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1959年3月），頁15。

³⁹ 1951年宣道會在調景嶺難民營中開辦；1953年起開始併入「建道聖經學院」。

⁴⁰ 1949年12月開幕，1952年易名「大世界遊樂場」，1954年7月關閉。

⁴¹ 參以下資料：Rev. John Bechtel, "Hong Kong's 'Coney Island' Hears the Gospel," *The Alliance Weekly* 88:18 (6 May 1953): 10；都乾初：〈宣道聖經學院學生聖工紀實〉，《中華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福音堂成立四週年暨宣道聖經學院第一屆畢業紀念特刊》（香港：香港調景嶺宣道會，1954年9月），頁82~83。

⁴² 梁得人、傅忠愛、李欣頌是建道首批在港的畢業生，他們被差往到北角堂負責開堂工作。

⁴³ 參以下資料：王路易：〈賀辭〉，頁13；胡欽：《安徽小子》，頁21。

會中他們詳細解釋〈宣道會香港區各堂通用會章〉，並作監選人。⁴⁴由以上事情可見，在滕牧師尚未加入北角堂以先，其會友及執事已認識他、領受過他的教導並了解他的為人；以致他們在數月後邀請滕牧師擔任堂主任的領導職務。

至於滕牧師為何加入北角堂，我們可看1982年他對當時的憶述：

我本來完全沒有牧會的意思，因為我的性格不適合牧師。曾有一間大教會請我牧會，但因無感動而拒絕，後來在1957年宣道會北角堂請我時，我卻接受了，因為早一、二天的夜裏我夢見自己作了該堂的傳道人，心靈裏有特別的感，所以該堂代表一來見我，我就答應了，果然這是主的安排。⁴⁵

滕牧師到北角堂牧會是得到劉福羣牧師的協調與允許，那時他在建道授課，劉牧師允許他身兼兩職，以致他每周二天在建道教書，五天在北角堂工作，這工作模式一直維持到七十年代。⁴⁶後來，劉牧師竟將自己在長洲山頂僅有的物業賣掉並將全數獻給北角堂，用作購買教會隔鄰的單位，並指明是給滕牧師作為堂主任的居所。⁴⁷從這件事情，讓我們知道劉牧師對滕牧師在北角堂事奉的肯定。

滕牧師在北角堂的服侍因前人多有論述，於此不贅。筆者在這裏只概括地探討他於不同時期的工作重點。最初，滕牧師到北角堂是承接尚英及許兆兩位傳道的工作，這兩人因遠赴東南亞宣教而相繼離任。滕牧師與許兆先生的新舊堂主任交職禮在1957年9月1日主日崇拜中舉行，如此展開他在北角堂長達三十年的服侍。⁴⁸當時北角堂創立已有五載，聚會地方是面積11呎乘33呎狹小的地鋪，⁴⁹人數約有五、六十人，他們大多是教育水

⁴⁴ 吳國麟：〈北角堂選出執事〉，《宣道消息》第1卷第10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1957年3月），頁2~3。

⁴⁵ 鄭炳釗：〈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的分析〉，頁340。

⁴⁶ 鄭炳釗：〈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的分析〉，頁340。

⁴⁷ 參以下資料：滕近輝：《都是恩典》，頁45~46；胡欽：《安徽小子》，頁50。後來滕牧師無私地將該單位分成三份：一份是自己及家人的居所；一份給同工黎金貞姑娘作居所；剩餘三分之一則與隔鄰教會單位打通，擴充教會聚會的地方。

⁴⁸ 周勤正：〈真摯流露的迎來送往〉，《宣道消息》第二卷第三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1957年9月），頁24~25。

⁴⁹ 胡欽：〈本堂歷史述要〉，《宣道會北角堂銀禧紀念特刊》，（香港：宣道會北角堂，1977），頁2。

準不高的老太太及婦女。⁵⁰ 早期北角堂牧者變動頻繁，至滕牧師上任時已是第五任堂主任。另外，教會成立不久就發生傳道人斂財的惡行，這使部分信眾及街坊失望離去；仍留下的會友對牧者的信心也大打折扣，在金錢奉獻上亦格外小心，導致各種聖工難以展開，教會陷入低谷，處境相當淒涼。⁵¹ 可想而知，剛上任的滕牧師是要面對何等樣的挑戰。

當年北角堂還有兩位傳道同工，分別是胡欽先生⁵² 及黎金貞姑娘。滕牧師因常要外出教學的原故，所以他主要是帶領教會及主日講壇的教導；胡欽先生即主要處理日常教會的行政事務；而黎姑娘主要是探訪及關懷會友。早年北角堂財政相當緊絀，教會根本不能自養自足。因此，滕牧師除了在日間到神學院授課之外，晚上還帶着疲倦軟弱的身軀做翻譯及寫作來補貼教會。根據胡欽牧師的追憶可見當時的景況：

若我早上六點起來，已見不到滕牧師了，他六點前便要離家去神學院教書。晚上十一點，他還亮燈寫文章。我清晨三時許醒來，燈仍亮着，原來他已起床祈禱讀經，預備一天的事奉。天天如是。他的身體瘦弱，常常發燒，然而大清早便拿起公事包教書去了。那時生活艱苦，每月頭教會支薪三百元給他，月底他拿五百元回來奉獻，補教會的不足，月月如是。滕牧師把生命擺在祭壇上和弟兄姊妹身上，是完全的生命的奉事。⁵³

滕牧師全然奉獻的態度感染了身邊兩位同工（或可說是互相感染）。當時管理財政的胡欽先生也是主動地少發自己的薪金，與教會共度難關。⁵⁴ 另外，黎金貞姑娘是一位帶着四個孩子的寡婦，生活殊不容易，但她卻把所住的房間分租一半出去，並把所得的租金以匿名形式全數奉獻教會。⁵⁵ 北角堂三位教牧和睦同心、彼此尊重及以身作則的精神，不久就贏得會眾再次對牧者的愛戴與敬重。

⁵⁰ 滕近輝講述、曾立華訪問及文字整理：〈滕近輝牧師談教牧健康心理與事奉態度〉，2008年11月6日修訂；該文章是華福節錄並修訂自《教牧期刊》第1期（1996年4月），頁117～122。

⁵¹ 胡欽：《安徽小子》，頁27，45。

⁵² 胡欽先生在1972年7月30日被按立為牧師。

⁵³ 《北宣家訊》第181期（香港：宣道會北角堂，2002年2月）。

⁵⁴ 胡欽：《安徽小子》，頁49～50。

⁵⁵ 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1952-2012）》（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2013），頁38～39。

不僅如此，初上任的滕牧師致力於講壇的服侍。這不單是上帝賜予他那獨特的恩賜才如此，更是他深深相信這是傳道人必須認真重視的事情。滕牧師曾接受鄭炳釗先生訪問時如此說：「講道確是一個牧會者的主要工作，因為這是栽培、引導與影響全體會友的通道，所以必須全力以赴。」⁵⁶

這正是他的事奉觀念。每個主日，除非他不在香港又或有路經香港的特別講員，否則他必定在北角堂的講壇上宣講。難得的是，他從來不重複宣講過的篇章，他每一次都是在上帝面前安靜、等候、領受新的信息，然後才與會眾分享；⁵⁷ 這可見滕牧師在這事情上的認真態度。如此，這位卓越講員的風聲很快就傳開了；⁵⁸ 在他上任很短的時間，北角堂便座無虛席，需要移師到更大的地方聚會。在他牧會工作踏入第二年之時，即1958年6月28日，他被按立為牧師；這是教會對滕牧師牧養的確實肯定。而同工及會眾們對他的信任，是他在不久將來於事奉上可以邁步向前的重要關鍵。⁵⁹

北角堂從這時候開始，因為有了穩定的牧者及強而有力的講壇信息，吸引了很多人前來慕道並加入教會；獻金也開始明顯增加，以致教會能遷到更大的地方聚會。地方大了，就能容納更多人前來聚會，獻金也愈來愈多，各種資源及配套也更為完備，人數不斷的增添，以致教會地方又出現擠擁而要遷往更大的地方。這循環在北角堂不斷發生，⁶⁰ 就如滕牧師在1982年時所說：「主恩待聖工，使它日有進展，聚會人數由七十人增至目前一千二百人，曾三遷會址。」⁶¹ 最難能可貴，是北角堂在規模與資源增多的同時，同工、執事及會友上下同心願意配合滕牧師的帶領，同心興旺福音；這不單在自己堂會範圍內，更是在堂會以外的地方。多年來，會眾有寬大的心胸樂意讓滕牧師無限制地到各地領會，在各神學院任教並出任院長，自由地參與不同機構的服侍；這讓他的事奉範圍愈來愈大，屬靈視野也愈來愈廣。⁶² 除此之外，會友更是恆常將堂會三分之二（在最高峰時是四分之三）的獻金用在北角堂以外的聖工：幫助各種福音機構、植堂、

⁵⁶ 鄭炳釗：〈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的分析〉，頁343。

⁵⁷ 黃碩然：〈生命的事奉〉，頁401。

⁵⁸ 王路易：〈賀辭〉，頁13。

⁵⁹ 滕近輝講述、曾立華訪問及文字整理：〈滕近輝牧師談教牧健康心理與事奉態度〉。

⁶⁰ Rev. Anthony G. Bollback, "Sixteen Years Old," *The Alliance Witness* 104:7 (2 April 1969): 16-17.

⁶¹ 鄭炳釗：〈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的分析〉，頁340。

⁶² 黃碩然：〈生命的事奉〉，頁401。

支持神學生及差遣海外宣教士等等。⁶³ 在滕牧師的帶領下，北角堂注重在本地開拓植堂、在海外推動差傳事工；⁶⁴ 這是北角堂的特色，也是宣道會在香港發展的模式。從六十年代起至1987年退休為止，滕牧師往往將從神而來的領受率先帶入北角堂，讓其成為區會明亮的示範與見證；而同工會友則上下一心支持他，使他在堂會內不用有後顧之餘，更可前往別處去承擔更多更大的福音使命。

六 滕近輝牧師與香港區聯會

如前文所述，滕牧師早年身兼多職，是西差會與本地堂會的橋樑，推動各項聖工；因此漸為圈內人熟識。再加上他那豐厚的學識、廣闊的心胸、謙和的屬靈氣質，使他早在五十年代末已成為香港宣道會舉足輕重的牧者。1959年1月下旬，各堂組成了「宣道會香港堂聯會」，滕牧師當選為主席。⁶⁵ 其後「宣道會香港堂聯會」改組為「宣道會香港區聯會」（下稱「區聯會」），在1963年3月9日召開代表大會，滕牧師被選為第一屆主席及執行委辦，兼任國外佈道部部長。⁶⁶ 從這時候起，他連任區聯會主席至1989年；⁶⁷ 整整三十年在聯會推動堂會自立、凝聚各堂力量彼此扶持、承接西差會的福音棒子、推動本地植堂與海外差傳等事工。

（一）推動各堂會達至「自養」

在1959年滕牧師被選為堂聯會主席之時，第一件事情是接續他早前在各堂會推動的自立工作，並隨即草擬了「五年（自養）計劃」，計劃在1964年3月各堂⁶⁸ 能夠達至「自養」之目標；⁶⁹ 期望在首年（即1960年）將西差會給本地教會的資助，由原先每月港幣\$5,000，大幅縮減五分之四

⁶³ 滕近輝：《給我羊——滕近輝牧師牧養感言》（香港：宣道，1995），頁197，198，210。

⁶⁴ 參以下資料：鄭炳釗：〈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的分析〉，頁340~341；滕近輝：《都是恩典》，頁49。

⁶⁵ 《宣道消息》第3卷第5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1959年3月），頁15。

⁶⁶ 《宣道消息》第7卷第2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1963年4月），頁10。

⁶⁷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54。

⁶⁸ 這包括香港九間堂會、台北一間堂會；當時台灣地區也隸屬於宣道會香港教區。

⁶⁹ 參以下資料：《宣道消息》第3卷第5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1959年3月），頁15；《宣道消息》第7卷第2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1963年4月），頁10。

至港幣\$1,000。⁷⁰ 當時計劃實施的最大阻力，是各堂因樓價高昂而難覓崇拜場所；最後宣道總會海外傳道部給予協助，提供「堂會自籌、差會贈予、差會借貸」各三分一的購堂方案，情況才得以舒緩。⁷¹ 1961年，北角堂及長洲山頂堂率先脫離西差會的經濟援助而提早達標。⁷² 該計劃最終在1964年2月完滿完成，在「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的旗下，共有十一間可自養自給的堂會，及十二間成立不久而未能自養的堂會。⁷³

（二）推動本地植堂

六十年代初期，「教會增長運動」的觀念尚未有華人教會討論之時，身為教會領袖的滕牧師，已於1961年在菲律賓舉辦的第三屆亞洲會議上發表了一篇名為〈香港教會如何面對未有福音傳到的區域及未完成的任務〉的文章。⁷⁴ 滕牧師對教會增長及植堂工作深感興趣，是他在北角堂及區聯會工作的重點，這是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可以證實的。宣道總會會長王路易牧師（Rev. Louis L. King）稱他為「教會增長的倡導者」。⁷⁵ 香港宣道會在短短五十年，堂會數目由零增至九十多間，在全港各教會中起了鼓舞的作用，滕牧師在這事情上可說是厥功甚偉。

香港宣道會植堂的事情可分為幾個階段。首先，在五十年代是一班宣道聖經學院及建道的畢業生在西差會的推動下，於香港各處開荒建立了十數間堂會與佈道所，這包括：調景嶺堂、竹園堂、北角堂、筲箕灣堂、荃灣堂、葵涌堂、鑽石山堂、油麻地堂及長洲山頂堂等；及後在大嶼山亦建立了坪洲堂、大澳堂及杯澳堂。⁷⁶ 當時剛上任北角堂堂主任的滕牧師在此事上也不遺餘力，根據胡欽牧師的憶述：

⁷⁰ William C. Newbern, *The Chairman's Report for the Year June 1956 – June 1959* (The C&MA China-Hong Kong Field, 1959), 2.

⁷¹ 季維善 (M. G. Griebenow)：《宣道會差會工作報告書》（香港：宣道會香港西差會，1961年8月），頁3~4。

⁷² M. G. Griebenow, *The Chairman's Report to Conference for the Year 1961* (The C&MA China-Hong Kong Field, June 1961), 2-3.

⁷³ Robert Patterson, *The Chairman's Report to Conference for the Year 1964* (The C&MA China-Hong Kong Field, 1964), 5.

⁷⁴ 王路易：〈賀辭〉，頁18。

⁷⁵ 王路易：〈賀辭〉，頁18。

⁷⁶ 杯澳堂的工作在1966年結束。參以下資料：《宣道消息》第8卷第3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1964年6月30日），頁27；W. H. Holton, *The Chairman's Report to Conference Hong Kong 1966* (The C&MA China-Hong Kong Field, 1966), 2。

滕牧師上任(北角堂)兩個月後，查問教會存款若干。我告訴他存款二百元多一點，其實全是省下來的。他提議每月撥七十元支援大澳福音事工。這個意念在我腦中打了幾個滾，我想到過去一年都沒有吃過一餐飽飯，現在還要分給人吃？當念及滕牧師的榜樣，於是轉念又想：一碗飯分給兩個人吃，不就是大家都養活了嗎！這不僅是北宣第一次與人分享，也是差傳的起點！⁷⁷

大澳佈道事工是「宣道會新界開荒佈道部」及「建道神學院學生佈道團」在1957年11月共同努力所建立的。當時開荒佈道部成員魏道榮先生在《宣道消息》裏曾發出呼籲，希望各堂能奉獻金錢以維持開荒佈道的工作。⁷⁸滕牧師在北角堂極缺乏之時，帶領堂會參與是項聖工。

第二階段主要是在五十年代末至整個六十年代，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西差會所策動的「天台教會／學校」的建堂計劃。西差會把握了這個便宜的植堂機遇，委派巴安義牧師(Rev. Anthony G. Bollback)專責向教育署入紙申請，在屋邨天台興辦學校及建立禮拜堂。⁷⁹宣道會宣仁堂、⁸⁰李鄭屋堂、觀塘堂及宣恩堂等就是如此被建立起來。第二部分即是北角堂在這時期設立的分堂，這包括在偏遠地區成立的錦田堂、大埔堂及沙田堂，與西差會共同設立的灣仔堂，及加入北角堂的愉園堂。這些教會除了大埔堂能延續至今之外，都因為各種不利情況而相繼結束。⁸¹雖然如此，滕牧師與北角堂在這事情的努力成為其他教會的模範，也奠定日後成功植堂的基礎。

第三階段即是區聯會及西差會合作的教會增長計劃(Mission-Church Ministry Partnership)，開始時間應為七十年代初。當時區聯會已註冊為一法團組織，⁸²能夠在「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有限公司」的名下擁有物業並申辦各項事情，而無需再轉折透過西差會辦理。這事情亦標誌着區聯會及屬下堂會已達至「自治、自養、自傳」的自立目標。話雖如此，身為

⁷⁷ 胡欽：《安徽小子》，頁48。

⁷⁸ 魏道榮：〈新界開光佈道近況〉，《宣道消息》第2卷第5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1957年11月），頁8～11。

⁷⁹ 參Robert Patterson, *The Chairman's Report to Conference for the Year 1964*, 4.

⁸⁰ 宣仁堂在1962年建立，在1977年結束。

⁸¹ 錦田堂、沙田堂、灣仔堂及愉園堂分別在1973年、1966年、1968年及1981年結束。

⁸² 註冊日期為1968年11月8日。

區聯會主席的滕牧師卻向西差會招手，希望西教士能一如既往協助華會，在本地的植堂及佈道事工擔任主導角色。而西差會亦欣然接受滕牧師的邀請，願意幫助並配合區聯會的工作，直至八十年代中旬才開始淡出本地事工。⁸³

這時期香港人口繼續膨脹，政府為解決住屋需求開闢了幾個新的衛星城市，興建了許多大型的公共屋邨，因一時難以應付眾多的工作，所以邀請慈善機構及社福組織前往新區為市民服務。當時香港宣道會抓緊這個機遇，進入新區提供服務並同時建立教會。宣道會西教士因為語言及文化上的便利，便主動接觸港英政府的高級西人官員，爭取在這些新區開辦各種社會服務。⁸⁴ 每當政府接納他們的申請，西差會就會第一時間聯絡區聯會；而區聯會隨即知會轄下堂會，務求在短時間內有堂會承接新的工作。⁸⁵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宣道會的植堂事工大多是沿着這樣的模式來進行的，最早期的例子有：華基堂、美孚堂（私人屋邨）、黃竹坑堂、麗瑤堂、元朗堂及興華堂等。滕牧師及北角堂更是身先士卒，投放大量資金與人力資源來推動是項工作，而植堂數目更是超越同儕。

第四階段即發生在1984年至1997年間，區聯會推出的「植堂十年計劃」及「十年增長計劃」。事緣在1983年，滕牧師率領六位區聯會同工出席祕魯利馬（Lima）舉行之第三屆世界宣道會團契會議（Third 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 Conference），⁸⁶ 議題是：如何擴展及建立教會。⁸⁷ 在會議期間，香港代表深受菲律賓和祕魯宣道會快速增長所激勵，並親眼目睹利馬教會驕人的成績。他們回來後一致認為香港宣道會也應該仿效，訂下明確目標以推動教會追求增長。⁸⁸

⁸³ 傅堅理牧師（Rev. Charles W. Fowler）與本文作者在電郵的談話記錄，2014年4月9日。傅牧師是美國西教士，父親是宣道會中國華南區及香港區的西教士傅證道牧師（Rev. Christian C. Fowler）。傅堅理牧師在1963年加入宣道會香港區差會工作，1986年至2002年為該差會主席。

⁸⁴ 呂焯安牧師訪問記錄，2014年3月25日。

⁸⁵ 郭瑞榮牧師訪問記錄，2014年8月7日。

⁸⁶ 滕近輝：《給我羊》，頁176~178。

⁸⁷ H. Robert Cowles, "Church under Construction," *The Alliance Witness* 118:9 (27 April 1983): 7-10.

⁸⁸ 朱裕文：〈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十年計劃之源起，發展現況與展望〉，《宣道文礪》第14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文字部，1994年4月），頁2~3。

〈香港宣道會植堂十年計劃〉建議書在1983年底由滕牧師親自撰寫，並在1984年開始實施。顧名思義，這時計劃只着眼於堂會數量的增加，並將旗下堂會分開三個組別。第一組別是即時有植堂實力之堂會，在十年內建立三間分堂為目標；第二組別是擁有相當實力但未預備植堂之堂會，其目標是在十年內植堂兩間；第三組別是一些剛被建立的堂會，區聯會將協助其成長並在十年內建一分堂。⁸⁹經過三年的努力，植堂進展非常理想；因此區聯會在1987年遂修訂計劃，將各堂人數、差遣宣教士人數、各機構增長目標等也納入計劃當中，再由滕牧師修訂原計劃書內容，成為全新的〈香港宣道會十年增長計劃〉。原先由1984年起始的十年計劃，則改為由1988年起至1997年止；期望計劃完結時，堂會數目增加一倍至120間、會友數量增加二倍至三萬人。⁹⁰

在計劃實施的十年內，香港宣道會沿用以往的植堂模式，這包括：租、買物業、向政府申辦各種類型的社區服務等。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區聯會訂立了明確目標，有計劃地將資源集中，並呼籲所有堂會成員一同以植堂方式加快福音的傳播。不過在實施期間，香港人心惶惶，社會抑起了出國移民的浪潮；有部分宣道會信徒也因此選擇離開香港，當中不乏在堂會擔當重要角色的人。在這個環境下，有部分中小型堂會感到相當吃力。雖然如此，滕牧師與區聯會所推行的植堂事工卻深入人心，這是宣道會在香港傳播福音的獨特模式，在其他基督宗派也起了相當的鼓舞作用。

（三）推動海外差傳事工

宣道會原初是「信徒與宣教士聯盟」，創辦人宣信牧師具有清晰的差傳異象與理念。在中國，早年翟輔民牧師亦留下佳美的典範。⁹¹此外，建道神學院也十分注重差傳；自上世紀初在廣西梧州建立以來，已不斷孕育出大批勇毅果敢的宣教士往海外各地開荒，成績驕人。滕牧師身為宣道會及建道的成員，也秉承這份寶貴的遺產。滕牧師非常重視差傳工

⁸⁹ 參以下資料：朱裕文：〈宣道會香港區聯會〉，頁2；滕近輝牧師：《香港宣道會十年增長計劃草案》，1987年，未刊書稿。

⁹⁰ 滕近輝牧師：《香港宣道會十年增長計劃草案》。

⁹¹ 翟輔民牧師是在1929年建立了中國第一家海外差會「南洋佈道團」，差派華人宣教士往東南亞各地宣教。

作，認為這是「基督的教會基本的取向」；⁹² 他四出宣揚大使命的重要性，直接帶動各堂會共同肩擔普世宣教的重任，使香港宣道會成為差傳工作的先導團體。⁹³

如上文所述，滕牧師早在1958年因劉福羣牧師的策動下成為「中華宣道會國外佈道團籌備委員會」的委員兼主席；經過年半多的籌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國外佈道團」正式成立，他繼任主席；而佈道團亦開始嘗試物色人選到海外宣教。1961年7月，滕牧師以香港區會主席的身分，遠赴菲律賓三寶顏市（Zamboanga City）出席宣道會「第三屆亞洲會議」，與眾亞洲教會領袖討論「各國本地教會如何能夠成為宣教的教會」這個議題。⁹⁴ 在會議期間，他被日本宣道會能夠差派第一位本土宣教士往巴西宣教所感動，從此燃亮他對華人教會差派華人宣教士往海外宣教的熱忱。返抵香港後，他將會議中所見所聞與北角堂的同工執事分享，眾人同得激勵並開始籌劃差傳事工；⁹⁵ 他們透過團契與主日學，並每年的差傳培靈會，將觀念滲入會友的意識之中。⁹⁶ 除此之外，滕牧師也將差傳理念帶進其他宣道會堂會，以致能夠聯合各堂力量將本地宣教士送往各宣教工場。⁹⁷

1962年，建道畢業生郭錦仙女士⁹⁸ 被差遣往越南華人地方宣教，於1月6日在北角堂舉行差遣禮，這標誌着香港宣道會國外佈道工作正式展開。⁹⁹ 同年6月，梁得人牧師夫婦經過五次越南入境申請後，終於獲得簽證並加入宣教士的行列。¹⁰⁰ 除越南外，國外佈道團亦差派宣教士往馬來西亞、印尼、高棉、台灣，甚至遠赴祕魯開展福音工作。¹⁰¹ 至1973年，

⁹² 滕近輝：《金輝歲月》，頁42。

⁹³ 李潔欣：〈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差傳事工研究〉（香港大學文學碩士論文，2005），頁35。

⁹⁴ 王路易：〈賀辭〉，頁15~16。

⁹⁵ "An Interview with Dr. Philip Teng," *The Alliance Witness* 116:1 (7 January 1981): 19. 此文轉載自：*His Dominion*, Canadian Church Growth Centre, Regina, Saskatchewan.

⁹⁶ 滕近輝：《給我羊》，頁152。

⁹⁷ "Chinese Churches Send Missionaries," *The Alliance Witness* 97:17 (22 August 1962): 20.

⁹⁸ 郭女士是1960年建道畢業生。

⁹⁹ 《宣道消息》第6卷第1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聯會，1962年3月），頁5。

¹⁰⁰ 參以下資料：Rev. Philip Teng, "Extending Gospel Light," *The Alliance Witness* 97:17 (22 August 1962): 11；《宣道消息》第6卷第4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聯會，1962年8月23日），頁8。

¹⁰¹ 郭瑞榮、凌民興：〈香港宣道會歷年差傳事工發展調查〉，《宣道文礪》第20期（香港：宣道會香港區會文字部，1995年4月），頁1~4。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國外佈道團與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合作，組成「中華宣道會海外佈道會」；兩個組織遂將各自進行的差傳事工合併，成為一個聯合差會，滕牧師當選主席。1974年該會出版《馬其頓異象》雙月刊，使宣道會及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會友更能了解宣教士的工作與消息。¹⁰² 1977年，同為建道神學院院長的滕牧師在院校增設「差傳系」，以培養更多宣教士人才，此為華人神學院的創舉。

這時候的滕牧師，在世界華人教會以至在亞洲各地教會，於推動差傳事工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1973年他與亞洲各區教會領袖於南韓漢城商討聯合推動亞洲教會差傳事工的可能性，並在1975年正式成立「亞洲差傳事工聯會」（Asia Missions Association），滕牧師當選第一屆主席。¹⁰³ 1976年，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CCOWE '76）在香港舉行，赴會代表有來自三十個國家共1,607間華人教會的代表；滕牧師身為董事會主席，在會議期間發表了〈華福宣言〉。¹⁰⁴ 從這些例子，足見他當時在華人及亞洲教會的位置。雖然如此，在1977年或以前，滕牧師從未到前線作開荒佈道。為了以身作則，他毅然放下繁重工作和仍需照顧的孩子，向北角堂請假一年，以攜同滕師母遠赴印尼宣教。難得的是，北角堂得悉事情後雖感到憂慮，但大家都一致通過支持滕牧師的這個決定。¹⁰⁵

1977年12月5日，滕牧師夫婦踏上為期一年的征途，前往擁有三十萬華人居住的西加里曼丹（West Kalimantan）宣教。期間他們遊走於各個村落及市鎮，每地方停留約三至五日主持佈道聚會及信徒培訓。滕牧師一面學習印尼語，一面建立教會，協助神學院；而香港堂會（主要是北角堂）則以金錢奉獻，支持及配合他在當地的工作。除關注華人的事情外，滕牧

¹⁰² 郭瑞榮、凌民興：〈香港宣道會歷年差傳事工發展調查〉，頁3~4；另參考：《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紀念特刊（1940-2010）》（香港：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2010），頁54。

¹⁰³ 參以下資料："Asians With Global Designs," *The Alliance Witness* 109:2 (16 January 1974): 32；「Asia Missions Association」網頁：<http://www.asianmissions.net/?page_id=7>（2014年11月3日下載）。滕近輝牧師被選為1973年至1982年聯會主席。

¹⁰⁴ Jack Campbell, "Vision and Mission," *The Alliance Witness* 111:23 (17 November, 1976): 20-21.

¹⁰⁵ 參以下資料：胡欽：《安徽小子》，頁54；"An Interview with Dr. Philip Teng," 20.

師亦幫助坤甸（Pontianak）達雅克族（Dyaks）的大學生建立教會。滕牧師身體力行，成為北角堂、香港宣道會及其他教會的佳美榜樣，對年輕一輩的信徒起了激勵作用。¹⁰⁶

香港宣道會在差傳事工所作出的貢獻，歷來都得到眾華人教會的肯定。1984年「香港差傳事工聯會」¹⁰⁷ 執行主任盧家駁牧師談及當時香港的差傳運動時，曾有以下的言論：

現在香港的差傳運動仍處萌芽階段，但推動最多的，是中華(宣道會)海外佈道會，和希伯崙差會，¹⁰⁸ 兩者其實全然是宣道會的差傳機構。¹⁰⁹

香港宣道會在差傳上能有如此佳績及讚譽，絕非偶然。其中有宣道會及建道神學院的屬靈傳統與教導，另得劉福羣牧師、滕近輝牧師及李非吾牧師¹¹⁰ 等領袖的推動，加上宣道會各堂會友的回應及承擔，方能成事。

（四）承接西差會的棒子

宣道會海外宣教的政策，一向實行「差會應盡快幫助本土教會有能力達致本色化及自立的目標；當某個宣教區有足夠數量的本土教會自立，差會就應協助他們成立一個聯合教會的議會，這個議會是在這些教會之上，有權柄管理轄下成員。」¹¹¹ 另外，根據上世紀二十年代宣道會中國華南區差會負責人翟輔民牧師的闡釋，本土教會要達致「自立」必須包含三個元素：即「自治、自養、自傳」。¹¹² 這些概念均適用於香港宣道會本土化的過程。以下筆者將運用國際事工差會（SIM）福樂（Harold Fuller）所

¹⁰⁶ "An Interview with Dr. Philip Teng," 20.

¹⁰⁷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為香港首間聯合各差會的機構，於1973年10月成立。

¹⁰⁸ 「香港希伯崙差會」由香港宣道會希伯崙堂於1972年成立。

¹⁰⁹ 引自李潔欣：〈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差傳事工研究〉，頁7。原文記錄在：盧家駁：〈宣道精神〉，《馬其頓異象》第54期（香港：香港中華宣道會海外佈道會，1984年3月），頁3。

¹¹⁰ 李非吾牧師是「香港希伯崙差會」的主要創辦人；致力推動差傳事工。

¹¹¹ *Manual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52 Edition (New York: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52), 73. 筆者翻譯。

¹¹²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宣道會早期在華宣教史略》（香港：宣道，1997），頁45。

提出的差會事工發展的四個階段，來幫助解釋香港宣道會西差會是如何將福音棒子交給華人教會，¹¹³也看滕牧師在當中所擔當的角色。

第一階段為「拓荒期」，以1949年中國宣道會西教士南下香港為起點，在踏入1957年為結束。開始的時候只有少部分南下的宣教士，為延續在中國大陸多年的事工，選擇停留香港並分別設立宣道書局及建道聖經學院。與此同時，他們看見大量孤苦無依的難民停留香港，當中更是有在國內已認識的宣道會會友，所以這些西教士便與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及建道神學生一起組織佈道團，於難民營及寮屋區展開佈道工作。如上文所述，因福音工作漸具規模，宣道會在1953年成立中國—香港教區；在1956年已建立了十間堂會，¹¹⁴而西差會也開始思量香港教會本土化的問題，同年他們通過香港本地教會的五年自養計劃。這時候正是滕牧師加入宣道會的時間，而西差會主席劉福羣牧師對他寄予厚望，致力栽培他，期望滕牧師將來能帶領香港宣道會的發展。¹¹⁵

第二階段為「家長期」，以1958年本地教會開始籌組華聯會為起點，在1968年香港區聯會註冊為法團組織而結束。當時宣道會在香港的佈道工作大多由西教士牽頭，特別是天台學校／教會的事工。雖然，本土教會經過了「五年（自養）計劃」並在1964達至預期目標；但是，當時的華人牧者大多經驗尚淺，仍需要西教士從中協助與監督。如上文所述，滕牧師當時擔當聯繫並籌劃堂／區聯會的工作，也是西差會與本地教會的主要橋樑。他與北角堂在自立的事情上是身先士卒，在各項事情上包括自養、植堂及差傳等方面，均成為其他堂會的榜樣。西差會的推動及堂會間互相扶持使本地教會邁向自立。

第三階段為「夥伴期」，根據前任香港西差會主席傅堅理牧師（Rev. Charles W. Fowler）的親身經歷，粗略認為這階段大約在七十年代開始；一直至九十年代中旬西差會才進入最後階段的「參與期」。¹¹⁶當時香港

¹¹³ 筆者在下文所訂定四個階段的時間是一個粗略的估計；利用Harold Fuller的模式只是方便闡述交棒的過程。

¹¹⁴ 九間在香港，一間在台灣。當時的中國—香港教區包括中國、台灣、香港三地。

¹¹⁵ 胡欽：《安徽小子》，頁47。

¹¹⁶ 傅堅理牧師與本文作者在電郵的談話記錄，2014年4月9日、4月18日。

區聯會已註冊為一法團組織。聯會在其名下擁有堂會的物業權，並可以向政府申辦各種事務的權利，這是彰顯本地教會已達至自治的階段。再加上大部分堂會已達至自養及自傳，華人牧師漸趨成熟，在原則上本土教會已稱得上是完全自立，能夠脫離西差會的管治。在這個時期，雙方進入了一個頗長時間並關係密切的宣教夥伴模式，傳牧師稱之為：「Mission-Church Ministry Partnership」。¹¹⁷ 西差會與香港教會在這階段能夠維持二十多年的宣教合作，且雙方一直能保持美好的團契關係，這在其他宣道會教區是相當罕見的。¹¹⁸ 究其原因，滕牧師是一個重要關鍵。

事情是這樣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宣道會西教士眼見本地教會漸漸成長，在很多事情上已能夠獨自處理；在這處境下，西教士內心很自然會產生很多的疑惑。部分西教士為即將要把自己創立或管理多年的聖工轉交華人，感到不捨與不安；部分西教士卻常感到本地教會不再需要他們，於是選擇做些零碎或次要的工作，而忽略了傳福音與建立教會的基本責任。在1973年，剛上任西差會主席的貝約翰牧師（Rev. John H. Bechtel）發現，部分同工存有以上的心態，於是召集所有的宣教士在一起，同心禱告尋求前面當走的路。他們經過商討後，都一致認為若沒有本地教會的認同，他們是很難再在本地開展任何工作。於是，貝牧師就將同袍的處境與滕牧師及區聯會同工商議；而滕牧師的答覆是：「香港教會需要西差會來推動聖工。」滕牧師的回應令西教士都感到相當驚訝。從這時候開始，香港西差會再次重拾開荒佈道及建立教會的熱情。¹¹⁹

雙方第一次展開工作是在美孚新邨。¹²⁰ 如上文所述，西差會四出尋找地方並以其名義申辦屋邨的社區服務，申請成功後轉交區聯會承接工作並建立堂會。堂會開辦之時西差會差派一對西教士夫婦到新堂與華人牧者

¹¹⁷ 傅堅理牧師與本文作者在電郵的談話記錄，2014年4月9日。

¹¹⁸ 在其他宣道會區，西差會與本土教會「夥伴期」的階段，一般約為五年至十年不等，要視乎各區情況。

¹¹⁹ 參以下資料：貝約翰：〈教會增長報告之三——中西合作〉，《世界華人教會增長研討會彙報》（香港：世界華福音事工聯絡中心，1981年6月），頁278～279；傅堅理牧師與本文作者在電郵的談話記錄，2014年4月9日。

¹²⁰ 在這裏建立了「宣美幼稚園」及「宣道會美孚堂」。當時貝約翰牧師還未出任西差會主席；這事工開展前，貝牧師與滕牧師是沒有作任何的知會與溝通，雙方攜手合作是出於奇妙的巧合。

一起開荒佈道，期限兩年；兩年後堂會將完全交由華人牧者主持。¹²¹ 就這個夥拍模式，西差會與區聯會合作多年，在香港多個公共屋邨開設自修室兼建立教會。

在這二十多年的夥伴期，西差會是全心全意的與區聯會推動香港的植堂事工，並且雙方保持着十分和諧的關係。對於這段日子，兩位前西差會主席貝約翰牧師及傅堅理牧師都不約而同歸功於滕牧師，稱許他那謙恭的性情、美好的靈性、廣濶的胸襟，並在區聯會內卓越的領導能力。滕牧師不單帶領區聯會做好各項工作，還時常激勵年輕的西教士共同努力開展聖工。在期間，西差會曾多次暗示要將事工或重要崗位交由區聯會來領導，但滕牧師往往謙虛的說：「既然聖工在西差會手中發展理想，為何要急於交棒呢！時間未到，當時機成熟，我們會告知你們。」而香港西差會努力協助本土教會開展植堂工作的模式，成為日後區聯會協助轄下堂會的模範。¹²²

至於香港宣道會機構交接的情況，如建道神學院及宣道書局等，分別於1975年及1980年由西差會轉交華人主理。

七 滕近輝牧師與建道神學院

在滕牧師的自傳裏，曾提到他對建道懷有深厚的感情，這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劉福羣院長伉儷的知遇之恩；其二是他一生最長的事奉崗位就在建道；¹²³ 最後是看到建道培育了多位海外宣教士，這正是他對神學教育的理想與心願。¹²⁴

在劉福羣牧師的著作裏，記述滕牧師是在1951年來到建道的。¹²⁵ 如上文所述，他可能是因為要代替趙君影牧師授課。當時建道在香港成立不

¹²¹ "Situation Report: China-Hong Kong," *The Alliance Witness* 110: 5 (26 February 1975): 20.

¹²² 參以下資料：貝約翰牧師與本文作者在電郵的談話記錄，2014年9月12日；傅堅理牧師與本文作者在電郵的談話記錄，2014年4月9日、4月18日。

¹²³ 滕牧師與建道的關係有六十多年。

¹²⁴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34~36。

¹²⁵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1979），頁139。

久，只有從梧州建道到香港繼續學業的二十位畢業班學生。¹²⁶ 1956年，滕牧師正式成為建道全職教員並擔任神學教授。不過，如上文所述，到1957年9月滕牧師在北角堂牧會後又再次轉為兼職同工，每周兩天在建道工作。

除在建道授課外，他亦負責處理教務方面的一切問題，他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吩咐教職員，要記得建道並非一間美國神學院，它是一間中國的神學院。¹²⁷ 1960年他出任神科主任；及後也出任差傳科主任。1975年西差會將建道交由區聯會主理，同年9月滕牧師擔任建道院長一職。為配合香港宣道會推動差傳事工，他於1977年開設「差傳系」，專事培訓宣教士人才。1980年將院長職務交由張慕皚先生接任，而他轉為院董會主席。¹²⁸ 1982年任榮譽院長，直至離世為止。

滕牧師對神學教育向來特別有負擔，除多年任職建道外，他早年曾同時任教三間神學院；在1974年領導一班海外年輕學者成立中國神學研究院並擔任義務院長一職；1987年北角堂退休後他轉往美國奈亞神學院（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出任華人部主任十年；¹²⁹ 1997年返回香港於牧職神學院擔任講師等，均可見他的心志。究其原因，除了滕牧師本身是一位「學者型」牧者外，他更看見在教會各種事奉崗位上，都迫切需要靈性與知識均衡發展的人來承擔聖工，¹³⁰ 特別在差傳事工方面。他認為在第三世界的神學院應成立宣教課程，挑起神學生對宣教的熱忱，這將使他們在教會更積極推動宣教工作。在出任建道院長期間，他創立了差傳系，這學系已證明是塑造及預備宣教人才的一個主力。¹³¹

另外，在建道由西差會移交華人教會的事情上，滕牧師是至為關鍵的。1975年霍敦院長（W. Henry Holton）年屆退休年齡，極需找人繼任他的職位；這時本地教會已自立多年，西差會是早有意願將建道交由華人主

¹²⁶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131。香港長洲建道是在1950年10月16日開幕的。

¹²⁷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139。

¹²⁸ 黃碩然：〈生命的事奉〉，頁400。

¹²⁹ "Campus News," *Alliance Life* 122:19 (30 September 1987): 14.

¹³⁰ 黃碩然：〈生命的事奉〉，頁400。

¹³¹ 王路易：〈賀辭〉，頁16。

理。1975年1月，西差會與區聯會達成協議，計劃在該年9月將建道完全交由區聯會負責，承擔行政與經濟上一切責任。¹³² 雖然滕牧師剛出任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但雙方皆堅持他出任建道新院長，方可安心。身為香港宣道會領袖，又為了交棒過程順利，滕牧師只得義不容辭地接受。¹³³ 歷史證明這個安排是合宜及正確的，建道由西差會轉交華人手上的過程既暢順又有效率。¹³⁴ 最主要原因是滕牧師本身得到各方信任之餘，同時身兼建道院長及區聯會主席，能將建道與區會作出更緊密的結連與溶合，這無論在佈道事工及在精神承傳等方面。

八 滕近輝牧師與宣道出版社

滕牧師自幼喜愛閱讀，對文字事工非常重視。如上文所述，他學成歸來的第一份工便是文字工作；而加入宣道會第一項工作也是在宣道書局，當時他是應劉福羣牧師的邀請作翻譯。¹³⁵ 他在宣道書局的第一部譯作，是在1956年7月出版的《現代心靈的疾病》。¹³⁶ 過了不久，他的譯作及著作就陸續刊載在《聖經報》與《宣道消息》。他出道不久已有多人認識，相信這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¹³⁷

在他擔任北角堂堂主任兼在建道授課時，已被宣道書局委任為顧問委員會委員。在1960年他同時出任編輯委員會主席及執行委員會委員。由此可見，宣道書局在許多重要的決策上，滕牧師必定是有分參與。¹³⁸ 1971年他開始寫書，第一本著作名為《路標》；其一生共撰寫了二十多本著

¹³² Westergre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Annual Report of China-Hong Kong for 1975*, 127.

¹³³ 滕近輝講述、曾立華訪問及文字整理：〈滕近輝牧師談教牧健康心理與事奉態度〉。

¹³⁴ Westergre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Annual Report of China-Hong Kong for 1975*, 127.

¹³⁵ 滕近輝：〈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¹³⁶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91。

¹³⁷ 王路易：〈賀辭〉，頁17。

¹³⁸ 王路易：〈賀辭〉，頁17。

作。¹³⁹ 1980年，區聯會由西差會手中接管宣道書局，並易名為宣道出版社。許朝英先生受聘為首任華人社長；而滕牧師即以區聯會主席的身分，對宣道出版社亦負起更大的責任。¹⁴⁰

滕牧師在宣道書局／出版社的資料不多，有待發掘。不過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他曾參與《生命聖詩》的製作。一直以來，劉福羣牧師一心要出版一本不分宗派中英對照的詩集，並早已搜集了六百多首聖詩資料；可惜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如願。其後，宣道出版社委任何統雄先生為總編輯，經過六年多時間，《生命聖詩》終在1986年面世。¹⁴¹ 詩集內全部歌詞均由滕牧師負責審訂，他最主要是審核歌詞是否符合聖經真理，其次是文字的潤飾；有部分聖詩還是由他親自翻譯的。¹⁴²

九 退休前的任務

滕牧師原本打算在六十歲時便退下北角堂的職務，退休後打算到各地從事宣教工作。但當胡欽牧師及北角堂執事會知道他有此意向時，甚感彷徨，因為他當時還沒有找到繼任人選；滕牧師知道自己不能就這樣退下來，所以後來打算到六十五歲才退休。¹⁴³

其實，滕牧師早在七十年代中旬已開始物色能延續使命的人選，而培育領袖是當時他的工作重點之一，他努力提攜新一代年輕人的舉措是令人津津樂道的。在香港宣道會方面，他於1979年招攬在加拿大雷城任教神學的張慕皚先生於翌年接任建道院長一職，當時張先生還不到四十歲。在

¹³⁹ 參考自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90～291。

¹⁴⁰ 參以下資料：王路易：〈賀辭〉，頁17；何統雄：〈懷念好弟兄滕近輝牧師〉，《恩典懷清輝：滕近輝牧師紀念特刊》（香港：宣道會北角堂，2014），頁72。

¹⁴¹ 何統雄：〈從《青年聖歌》到《生命聖詩》〉，2010年7月1日上載於福音文宣社網頁：<<http://www.evangelite.org/2010/07/01/%E5%BE%9E%E3%80%8A%E9%9D%92%E5%B9%B4%E8%81%96%E6%AD%8C%E3%80%8B%E5%88%B0%E3%80%8A%E7%94%9F%E5%91%BD%E8%81%96%E8%A9%A9%E3%80%8B-%E4%BD%95%E7%B5%B1%E9%9B%84/>>（2014年11月11日下載）。

¹⁴² 參以下資料：何統雄：〈懷念好弟兄滕近輝牧師〉，頁72；滕近輝、蕭壽華（訪談）：〈怡情快拍：回望半世紀的恩典（下）〉，《宣訊》第34期（2002年10月）。

¹⁴³ 林高勵志訪問記錄，2014年7月9日。

同一時間，滕牧師推薦只有二十八歲的許朝英先生擔任宣道出版社社長職務。在北角堂方面，在堂會成長並曾擔任青少年部部長的蕭壽華先生，被執事會及滕牧師推舉為候任堂主任；當時年輕的蕭氏剛從加拿大學成歸來，隨即在1985年獲邀到北角堂牧會，1986年被按立為牧師，並於1987年接替滕牧師為北角堂堂主任，這在當時可算是十分破格的舉動。¹⁴⁴

除此之外，滕牧師為了提攜宣道會的第二梯隊，在退休前四、五年一改他在區聯會的開會方式。過往多由他提出議事事項及處理方案，再經執委同意後就作出決定。但當與一批新進執委開會時，滕牧師卻讓各人從不同角度去考慮事情，而他就細心聆聽他們的意見，再循循善誘的分析，引導大家作集體決定。雖然最終決定未必是最理想的，但他都願意一起承擔，甚至有責任時則由他來獨力背負。另外，他親擬的「十年植堂／增長計劃」為香港宣道會未來訂定了明確清晰的路向，此舉除了在他退休時有穩定軍心的作用，也為香港宣道會日後的發展奠下良好基礎。¹⁴⁵

十 總結

上文已概括闡述了滕牧師在香港宣道會的工作。總的來說，早年的滕牧師只是一位文字工作者、聖經解釋者與神學教育家，期望透過文字及宣講，把聖經真理向他人說明。其後，他開始參與聯繫的工作，分為兩方面：西差會與本土堂會的聯繫；以及本土堂會之間的聯繫。再者，滕牧師參與牧會工作，個人與牧養的教會開始為人熟悉，得到西教士及華人同工的信任；在本土教會推動各項事工，使之邁向自立。六十年代起，滕牧師已成為領袖人物，除了籌組區聯會，承接西差會福音棒子外，他在本地促進植堂拓展，向外推動差傳事工，打造宣道會在香港發展的模式。退休前，滕牧師提攜新人，為區會訂下長遠目標，使福音使命能夠延續，聖工得以不斷擴展。

¹⁴⁴ 參以下資料：林高勵志訪問記錄，2014年7月9日；蕭壽華牧師訪問記錄，2014年8月27日。

¹⁴⁵ 參以下資料：郭瑞榮牧師訪問記錄，2014年8月7日；郭瑞榮：〈心事細微，目光遠大——十三屆區聯會主席滕近輝牧師〉，《宣訊》第172期（2014年4月），頁3；朱裕文：〈一位滿有感染力的領袖〉，《宣訊》第175期（2014年7月），頁3。

香港宣道會能有今天的規模，滕牧師實在是功不可沒。時至今日，該會處處皆可發現他往昔的蹤跡，其影響既深且遠；主要原因，是他三十多年來默默耕耘、忠心服侍及多方承擔的結果。其次，他那美好的靈性、謙和的性情，獲得多人信任願意與他同工。另外，學貫中西的滕牧師有機會四出服侍，各地見聞令他高瞻遠矚，成就他擔當領導的角色。最後是他那身先士卒、身體力行的精神，使他個人及牧養的堂會，成為眾人與教會美好的見證和典範。

撮 要

滕近輝牧師是近代知名的華人牧者，也是香港宣道會舉足輕重的人物。滕牧師在1955年或以前已加入宣道會，1987年宣布退下前線，至2013年他離世為止。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滕牧師致力推動文字工作、神學教育、差傳佈道、植堂擴展，對宣道會在香港的發展影響深遠。另外，滕牧師那謙和的性情、胸懷普世的視野、身先士卒的精神，均贏得宣道會人士普遍的愛戴與敬重；這使他能擔當會內聯絡、維繫、領導及顧問的角色，與同袍齊心合力，實踐福音使命。本文以歷史學角度，回顧及整理昔日滕牧師在香港宣道會各個片段，同時亦探討他在不同時期於不同崗位所扮演的角色，分析滕牧師對香港宣道會的影響與貢獻。

ABSTRACT

Rev. Philip Teng is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Chines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and is a significant figure in HKC&MA. Rev. Teng joined C&MA in or before 1955 and has decided to retire from the front line in 1987, until he passed away in 2013. During this half century, Rev. Teng has been promoting Christian literature, theological education, missionary & evangelism as well as church 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He has been very influent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HKC&MA.

On the other hand, Rev. Teng's humble personality, universal vision and leadership by example, has won the love and respect from a wide spectrum of individuals from C&MA. This allowed him to take up the role of liaison, support, leadership and consultation, and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n evangelism together with other partners in harmony. This paper seeks to review and arrange the facts regarding Rev. Teng being at HKC&MA from the historical angl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to explore the various roles he play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o evaluate his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 to HKC&MA.